

“包容性竞争”理念与金砖银行^{*}

樊勇明 贺 平

摘要：金砖银行的成立，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各种力量深度整合。国际体系发展变化的动力，由发达国家的“一元驱动”转向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发力的“多元并驱”格局。以此为背景，金砖银行应运而生，它的建立是金砖国家在现有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格局中奉行“包容性竞争”理念的生动体现。“包容性竞争”追求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的共同发展，推动不同理念、不同发展模式、不同道路、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互动和协调，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最终达到双赢的结果。“包容性竞争”不否认相互之间利益的差异，但是更强调通过协商、妥协等方式和平地解决利益冲突与各种争端；它同时也适用于处理金砖国家之间关系。在金砖银行的筹建和将来的运行中，金砖国家之间也会有分歧，但是齐心合力办好金砖银行是金砖国家共同利益之所在。

关键词：包容性竞争 金砖银行 全球治理 国际体系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2-0001-14

正值201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70周年之际，在巴西举行的第六次金砖国家领导人福塔莱萨峰会上正式签署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协议。按照预定时间表，金砖银行筹备组将于2015年5月前后进驻上海，开始实际筹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于2016年开业。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也称新发展银行，是“做实”金砖合作的标志性产物，人们一般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或新发展银行称之为金砖银行。金砖银行问世的意义，不只在于国际金融体系又多了一家新的成员，也不只在于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又多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融资渠道。金砖银行的成立和运行，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体系转型的具体行动，参与全球

^{*} 本文是《关于金砖合作“新发展观”的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关于金砖合作“新发展观”的研究》项目得到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的资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治理的一个新起点。金砖银行的启动，一方面预示着欧美国家借助布雷顿森林体系垄断全球金融治理的终结；另一方面，从金砖领导人福塔莱萨峰会发布的“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可持续解决方案”中可以发现，金砖银行也根本无意成为现有国际金融治理机构的对立者或取代者。

本文尝试基于“包容性竞争”^①理念，从国际体系变革和全球治理的角度出发，分析金砖银行成立的国际背景，厘清金砖银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阐述金砖国家通过金砖银行来体现对全球治理改革的利益诉求，并对金砖银行将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展望和预测。

一、“包容性竞争”理念是对国际体系演变理性判断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2008 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国际体系变化发展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美欧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国际体系演变发展的主导力量。尽管在二战结束以来漫长的几十年中，美国也有力不从心之时，也不乏在对手的攻势之下出现疲态或颓势，但是总体上居于引导国际体系发展变化的主动地位。2008 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是前所未有的。这场危机从实力、制度和心理上沉重地打击了美国，从而使得美国既无力也无心继续充当国际体系发展变化的主导国。当然，美国经济正在恢复，自信心也有所回升。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2015 年 2 月 13 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乌克兰局势发表言论时说，当一些国家不按我们的要求去做，美国需要强迫他们去做。这番话初看确实是豪气冲天，但是令人注意的是，奥巴马使用了“偶尔”二字。国际社会对此的解读是：强人所难，偶尔为之尚可，但因实力不足，难以继，更不可能成为常态。^②2008 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体系大分化、大组合、大变动尚在持续，守成大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博弈方兴未艾，国际格局的发展前景充满变数。

冷战时期，虽然美苏之间在政治和军事上对峙和争霸，但由于苏联一直游离在世界市场以外，战后的全球经济秩序事实上一直由欧美国家把持。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两个平行市场合二为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渗透和扩展至全球，美国主导全球经济秩序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冷战结束后一个短暂时期，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达到顶峰。但是好景不长，美国在 2007 年陷入“次贷”危机，并于次年引发全球

^① “包容性竞争”的概念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逸在中心内部学术讨论中率先提出的。本文在此启发下，结合金砖银行的筹建，对其内涵、外延，以及表现形式等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在此特此向沈逸副教授表示感谢。

^② “奥巴马：必须强迫一些国家做他们不愿意的事”，

<http://world.huanqiu.com/article/2015-02/5667906.html>

性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造成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打击，仅2008年的实际GDP就环比骤降6%。现在，美国经济略有好转，但却是以“量化宽松”形式向他人转嫁危机为代价的。美国的政治信用度和制度优越性则因此受到世界各国空前未有的质疑。^①为走出萎缩泥潭，欧盟也开始仿效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在“美版”量化宽松后遗症尚未消失的情况下，“欧版”量化宽松又将对美欧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产生多大负面影响，目前还难以估计。

全球性金融危机在实力、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对美欧在全球治理格局主导地位的消极影响将长期存在。发达国家一元主导的格局已不复存在。

首先，无论是在美国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近期因希腊问题而引起对欧盟存续的质疑，都体现出发达国家内部对自身政治制度和经济秩序的强烈反省和自我批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欧美国家都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应对内部危机上去，用于对外事务的意愿和资源将会明显下降。欧美发展模式对非西方国家的吸引力将进一步下降。

其次，美欧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运转失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共识”的金字招牌下，对发展中国家颐指气使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中制度设计的不公平和运行的不稳定性，引起各方的强烈不满。围绕着国际治理体系的改革，各大国的利益在重组，理念在重塑，相互关系在重调。

第三，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显著上升。金砖国家的GDP和贸易额分别占世界的21%和15%。金砖国家不只是潜在的市场，而已成规模巨大、持续增长的现实市场。虽然，金砖国家目前在不同程度上面临因美国退出量化宽松造成的冲击，但是在整体上经济出现积极向上的走势。中国正在主动调整经济；印度莫迪新政府揭开了大规模改革的序幕；南非祖玛新一届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2019年使经济增长5%；巴西的罗塞夫总统再次当选，经济面临转好的新机遇。即便俄罗斯因乌克兰事件遭到西方制裁而处境相当困难，但经济仍然保持着总体稳定。

需要强调的是，金砖国家从来不是单纯的个别国家的概念，而是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区域色彩。中国与亚太、巴西与拉美、南非与非洲、印度与南亚、俄罗斯与中亚和东欧，都呈现出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金砖国家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各个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推进者。例如，中国一直致力于在东亚范围内建立“10+3”和“10+6”的自由贸易安排，推进覆盖亚太各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

^① 樊勇明：“全球治理新格局中的金砖合作”，载《国际展望》2014年第4期，第102页。

伴关系（RCEP）。2014 年 11 月在北京举行第 22 次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更是提出了建立亚太自贸区等宏伟目标。此外，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开发和开放、中印缅孟组成的亚洲经济走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等次区域和跨区域合作中，金砖国家也都开始扮演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正是有鉴于此，金砖国家领导人在第六次峰会发表的“福塔莱萨声明”中明确指出，“金砖国家共同确立了其作为推动世界经济稳步增长主要动力的地位。金砖国家继续为全球经济增长及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减贫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性政策有助于稳定全球经济，创造就业，减少贫困，消除不平等，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了贡献。”^①

面临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也曾表现出让渡部分国际权力的积极姿态，但当最危险时刻过去以后，欧美国家对改革国际治理体系的意愿大大下降。在此情况下，国际体系内的守成力量和新兴力量必然地出现某种程度的竞争。虽然，新兴经济体还处于弱势，还远远没有大到取代守成力量的地步，守成力量也远没有衰落到愿意更多接纳新兴力量的地步。但是，金融危机引发的两种力量的竞争已经表面化。^②全球治理开始明显出现两个中心：一个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集团（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原八国集团退回到原来的七国集团的格局）；另一个则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任何一个集团都不可能单方面主导国际经济秩序，支配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倡导进行渐进式改革；美欧发达国家，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守成者，却在改革的道路上，一步三回头，进一步退两步，甚至逆向而行。这种态势，又使现有国际体系中的内在缺陷和矛盾进一步凸显，金砖国家和广大新兴经济体要求改革现有国际体系的要求也就越强烈。

虽然金砖国家和新型经济体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在改革现有国际体系的利益诉求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改变不平等国际秩序的愿望是一致的，彼此也是能在相当程度上相互协调的。大家都认识到，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才更需要形成一种国际机制协调立场，共同发力。

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美国“一元主导”的国际体系已经过去，“多元并驱”的国际新格局正在形成。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明确指出，“我们不仅正在目睹美国自诩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短暂时期的结束，从更广泛的意义

^①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福塔莱萨宣言”，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1179_611310/t1175283.shtml

^② 苏长和：“中国与国际体系：寻求包容性的合作关系”，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1期，第14页。

上说，我们也正目睹延续多个世纪的西方主导地位的终结……相对衰落的西方将不得不与世界其它地区合作。”^①

二、“包容性竞争”理念是处理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准则

“包容性竞争”理念是由“包容性增长”概念逐渐发展和完善而来的。

包容性增长是一种追求均衡、有序和普惠的经济发展模式，根本目的是让所有地区、国家、人群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益处，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

“包容性增长”最初见诸于2008年出版的《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一书。该书是2005年由亚洲开发银行资助，亚行经济研究局及其驻中国代表处进行的题为“以包容性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的研究项目的成果。^②“包容性增长”的提法很快受到各方注意。2009年和2010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两度在APEC峰会上提出通过“包容性增长”推动亚太经济合作。

2014年，“包容”再次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关键词。首先是2014年7月召开的第六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发表的福塔莱萨声明的标题就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可持续解决方案”。习近平等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声明中庄严宣称：“金砖国家矢志谋求和平、安全、发展、合作。在新一轮会晤中，在继续致力于实现上述目标的同时，我们承诺深化伙伴关系，实现基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愿景”。^③在同年12月的G20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又提出“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④

与“包容性增长”强调各方都能从彼此的增长中受益理念相比，“包容性竞争”理念的重点则在于诠释在增长和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道路、不同体制和机制以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互动博弈关系。

“包容性竞争”理念既强调竞争，又强调包容，主张竞争和包容不是对立的两个方面，而是能够，也是应该能够实现两者有机统一的。竞争并非只有“零和竞争”，还存在“非零和竞争”。

^①[英]马丁·沃尔夫：“中国能‘和平’崛起吗？”<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5645?full=y>

^②林毅夫，庄巨忠，汤敏，林瞰编：《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8年版。

^③“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福塔莱萨宣言”。

^④“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发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15/c_1113263795.htm

所谓“零和竞争”，是指一方所得等于另一方所失，从而此消彼长，或者说得失总和为零；所谓“非零和竞争”，又称为竞合，是指双方既竞争又合作，得益之和大于零的状态。

在国际政治领域里，传统的国际格局强调竞争，主要体现为市场与市场的竞争、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竞争等三种形态。

首先，市场竞争的核心是要素禀赋的竞争。古典贸易理论认为，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差价来源于生产过程中各自的生产要素成本的差价。一国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低，从而形成各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和国际分工。影响国际市场竞争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源、劳动力、资本、科技、管理、信息等。其中，资源、劳动力属于初级要素，可变性较小；资本、科技、管理、信息等要素属于高级要素，可变性较大。一般而言，高级要素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作用更大，高级要素丰裕的国家往往处于全球经济链的上游。缺乏自然资源的日韩两国跻身经济强国就是案例。当然，在国际经济运行的现实中，要素禀赋常常受到关税或其他壁垒的扭曲。为了保护本国市场，适当的关税壁垒是必要的，其范围往往是各国协商一致的结果，因此是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但如果某个国家为阻挡他国商品进口，设置不合理的贸易壁垒或者滥用双反手段，则属于恶性竞争的范畴。

第二，国家间竞争的核心则是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比拼。毋庸讳言，近现代的历史主要是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在殖民主义时代，工业强国运用枪炮和商品向世界扩张，世界其它地区处于被掠夺、遭瓜分、受剥削的地位；与此同时，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列强之间发生不断冲突和战争，由此引发地区冲突乃至世界大战。二战以后，虽然世界进入开放经济时代，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赖本质上还是没有改变原有的不平等关系。例如在金融领域，主导国家利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获取铸币税，无偿占有别国大量资源。当然，与殖民时期的直接占领和掠夺相比，开放经济至少为世界和平提供了某种可能。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随着国际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梯度转移，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欧美国家的经济优势明显受到削弱，国家间竞争关系正在向更加平等包容的方向发展。

第三，国家集团间竞争的核心是理念之争、制度之争、规则之争。二战以后，美国依靠无可匹敌的霸权地位，按照自身需要设计国际规则、建立国际制度，安全上表现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金融上表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贸易上则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冷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国一直保持着对国际组织的主导和

对国际规则的垄断。冷战结束以后，在“历史终结”的幻想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视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结构改革的“万能良药”，并强行推广。受其影响，1997年东亚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是席卷全球。欧美国家一方面紧急应对金融危机对自身带来的颠覆性冲击；另一方面又假手区域和跨区域的所谓“更深一体化”，力图在新一轮规则制定中占领先机。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等新型经贸谈判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其要害正是美国力图借此重新掌握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执行权。^①

二战以前，国际竞争主要遵循“非赢即输”的丛林逻辑，在经济上采取与邻为壑的重商主义原则，最终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和革命。二战以后，发达国家根据自身偏好制定国际规则，力图巩固其在金融、科技、人力资源等领域的优势。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规则和制度，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但不幸的是，基于制度的竞争又导致了东西方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新一轮的守成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国际竞争已经开始。但是，新一轮竞争能否避开上述零和竞争格局吗？答案是肯定的。包容性竞争的目的不是追求你死我活的结局，而是把竞争作为增加福利和提高质量的手段，最终结果将是“你我都更好”。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低级政治和高级政治的融合，极大地推动了大国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相互之间的关系从简单的“非友即敌”的对立关系向合作与竞争的互动关系转变。冷战的结束，不只是东西方对立的结束，更多地是从根本上宣告了人类社会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出现全球性的大规模的战争。尽管存在着小规模战争和各种安全威胁，但是国际政治的核心从军事转向经济，从战争转向发展，从结盟转向合作，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经济竞争是激烈的，但是并不排斥经济合作。一国的发展并不妨碍另一国的发展，甚至为别国的发展创造积极的条件。国家间竞争的目标已经超越“零和”，追求“双赢”已经成为共同的目标。就拿现今西方因乌克兰事件制裁来说，欧盟已经认识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困境。德国的默克尔总理和法国的奥朗德总统为此忙不迭地跑到俄罗斯进行斡旋，力促俄乌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尽管会有反复，但是俄乌危机已经不再呈现持续升级的态势。简而言

^① 樊勇明，沈陈：“TPP与新一轮全球贸易规则制定”，载《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5期。

之，冷战的结束，已经使得各大国和国家集团之间“零和”博弈的空间大大压缩。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意识使得各国对竞争的价值、竞争的理念、竞争的方式有了新的认识，互利共赢的意识正在成为大国间竞争的主导。

第二，竞争的前提和过程体现在动态的包容之中。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之间允许不同理念、不同发展模式、不同道路、不同政体、不同意识形态的共存共荣。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华尔街制造的金融杠杆泡沫，根本原因在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也即是制造业与金融业的失衡。失衡的根源在于发达国家利用美元霸权地位在全球攫取超额利润。即便如此，全球性金融危机还是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从各自的角度来共同来解决。虽然始作俑者是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但是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无一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没有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许多国家还处在封闭之中，没有大规模的国际产业和资本的转移，新型经济体能够在世界经济之林占据一席之地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面临问题和危机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协商，是妥善解决问题，纠正国际秩序中不合理成分的唯一明智的选择。作为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来说，只有如此，才能在经济上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在政治上才可能作为一个善意的国家集团对国际事务和国际体系的改革产生积极影响。

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如此，处理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也是如此。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发起 TPP 和 TTIP 两大跨区域贸易谈判。TPP 和 TTIP 包含大量发展中国家暂时无法接受的“高水平”规则。如若达成协议，许多新兴经济体将被阻挡在外，世界经济将面临新的分裂。还有许多评论说，美国发起 TPP 和 TTIP 谈判明显具有针对中国的意图。对此，中国除了利用 RCEP 等区域一体化倡议和相应机制抵消负面影响以外，还是秉持了“包容性竞争”理念，正视 TPP 中某些合理性，看到它所主张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化有利于倒逼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的改革，对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可能未必完全是一件坏事。也正因如此，在 2014 年的北京 APEC 峰会上 RCEP、TPP 的谈判成员国才形成了共建亚太自贸区的路线图，为亚太一体化指明了新的方向。

第三，包容性竞争并非无视竞争和回避冲突，而是促进良性竞争，引导善意互动。尽管现存国际体系主要是根据发达国家的意志设计的，但中国等新兴国家同样从中受益。李克强总理在访问印度时曾撰文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运行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维护者，中国愿意与印度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推进这个体系。同样，汪洋副总理在美国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无意挑战美国。以上表态反映了中国领导人

对本国及其与现有国际体系关系的战略判断。新兴国家与现存体系之间的合作大于冲突，即便出现冲突，也主要通过协商、妥协等方式和平解决。

特别要指出的是，强调双赢和互动，并不是刻意回避竞争。光靠体制内的自觉要去解决现有国际机制中的种种问题是不现实的。对实力和意愿双双下降的美欧发达国家而言，也确实需要来自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的竞争。没有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国家的外部压力，许多问题根本无法解决。与此同时，金砖国家普遍与发达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政治、外交合作，双方已经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沟通和交流机制，完全可以就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协商解决问题，共同致力于全球治理的各个议题。

金砖国家既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也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改革者。不能把金砖国家的合作和发展看成是一个国际体系对另一个国际体系的取代，而应将两者视为不同利益、不同机制的长期并存、和谐共处。

三、“包容性竞争”理念是金砖银行立行之本

由于 2008 年全球性危机源于金融领域，因此改革不合理国际治理结构的突破口也集中于此。在过去 30 年中得益于产业和资本的全球性梯度转移，金砖国家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金融资本。据统计，截至 2014 年 4 月，金砖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超过 5 万亿美元，占到全球外汇储备总资产的 75%。其中，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已经超过了 4 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俄罗斯、印度的外汇储备也非常庞大。

金砖银行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成立的。金砖国家在 2013 年德班峰会上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于 2014 年达成协议。根据协议，金砖银行的总部位于中国上海，核定资本为 1000 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 500 亿美元，由初始成员“金砖五国”平均出资，各国享有平等的投票权。五个成员国都将派出自己的财政部长或央行行长，担任银行的董事代表，负责制定银行具体操作规程。金砖银行行长采取轮值制度，每五年为一个任期，首任行长来自印度；巴西、俄罗斯将分别提名银行董事长和银行理事长；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将建立金砖银行非洲地区中心。金砖银行允许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入，但规定初始的金砖五国资本份额不能低于 55%。基础设施被设定为金砖银行的主营项目，目的是弥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能力的不足，为广大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保障，创造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世界。

自 2012 年新德里峰会提出建立金砖银行以来，国内外关于银行定位，尤其是金砖银行与现有体系之间关系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大体来说可分为对抗论、平行论、补充论、互动论四种。

(1) 对抗论。美国雪城大学政治学教授坎贝尔 (Horace G. Campbell) 认为，金砖银行有能力挑战美国的“过度特权”。所谓“过度特权”是指美国利用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能够将通货膨胀转移至他国，保持高额的财政赤字而不受惩罚。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转嫁危机的做法，更加激怒了其他国家。在坎贝尔看来，金砖银行为贫穷国家打造了提供贷款的金融平台，并将挑战世界银行在当今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①海牙全球正义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则认为，金砖银行的建立可能给本已过度多样的国际体系带来伤害，并鼓励墨西哥、印尼、韩国和土耳其（所谓的 MIST 国家）采取类似的行动，使全球治理的重心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现行治理机制向不同国家联盟的新机制转移。^②

(2) 平行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官员、现为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曼登 (Ousmène Jacques Mandeng) 在《世界真的需要金砖银行吗？》一文中提出金砖银行应该集中精力建立一个联系金砖五国和其它新兴市场的金融基础设施，早期计划可以从金砖五国的国家开发银行本币互换开始。如果金砖银行能够建立起强有力的金融基础设施，它将突破现有国际金融架构的主要限制。^③尤尼斯等人似乎怀疑金砖国家是否真的只是一个对现行体系补充、辅助的机构，因为金砖银行建成后的体量将超过世界银行，从而成为完全不与世界银行挂钩、扩大版的清迈协议，乃至第一个定位为全球覆盖 (global reach) 的区域协议。^④

(3) 补充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学教授琼斯(Stephany Griffith-Jones)认为，现存的多边和地区发展银行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乏善可陈，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层面的开发银行与多边金融组织之间缺乏配合。琼斯在为联合国撰写得一份关于金砖银行文稿里指出，金砖银行的优势在于它基于五国的国家开发银行之间紧密互动，因

^① [美]贺拉斯·坎贝尔：“金砖银行挑战美元的过度特权”，载《中国投资》2014年第8期。

^② Jill Coster van Voorhout and Thorsten Wetzling, “The BRICS Development Bank: A Partner for the Post- 2015 Agenda?”, *Policy Brief*, November 2013, The Hague Institute for Global Justice, p.4, http://thehagueinstituteforglobaljustice.org/cp/uploads/publications/policy-brief-7-BRICS_1391003524.pdf.

^③ Ousmène Jacques Mandeng, “Does the World Really Need A BRICS Bank?” July 15 2014, <http://blogs.ft.com/beyond-brics/2014/07/15/guest-post-does-the-world-really-need-a-brics-bank/>

^④ Noshua Watson, Musab Younis and Stephen Spratt, “What Next for the BRICS Bank,” *IDS Rapid Response Briefing*, May 2013, <http://www.ids.ac.uk/publication/what-next-for-the-brics-bank>

此金砖银行将成为现存体系的重要补充，能够弥补世界银行和其它地区发展银行的不足。^①

(4) 互动论。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学会的助理教授卡拉卡图 (Joe Thomas Karackattu) 在题为“金砖银行的前进之路”的文章中认为，金砖银行能够成为金砖国家参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20国集团及其他多边金融机构的杠杆。短期看，成员国将在银行运行的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中期目标则是促进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城镇化，并最终扩展银行的地理范围。^②中国学者朱杰进在《金砖银行历史性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文中也提出，金砖银行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传统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发挥催化剂的作用，从而将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推动力。^③

以上论断或多或少反映了金砖银行的某一个侧面。虽然对抗论看到了金砖银行对全球金融治理结构的挑战，但把两者视为零和关系，夸大了两者的对立和冲突。补充论则看到了金砖银行与现行体系之间的互补关系，但忽视了发达国家不愿轻易放弃原有的领导地位，进而可能采取排挤打压新兴国家的手段来应对金砖国家的挑战。平行论强调金砖银行拥有不同于世界银行的运营模式和超过世界银行的资金体量，因此是与世界银行的平行存在，未免看轻了全球治理中权力角逐的分量和谋略。互动论虽然看到了金砖银行与现行体系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却没有区分互动所包含的内容，低估了金砖银行推动国际体系变革可能面临的阻碍性因素。

因此，有必要从“包容性竞争”的理念去定位金砖银行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来说，“包容性竞争”格局下的金砖银行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金砖银行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决心和智慧。鉴于金砖五国地理位置相距遥远、政治体制相异等原因，金砖国家成立之时曾遭到不少人的质疑和唱衰。然而，事实胜于雄辩。金砖银行的建立展示出了金砖国家内部高度的求同存异意愿和巨大的协调妥协能力，充分表明金砖国家有底气、有能力在国际舞台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有能力采取共同行动，推动国际秩序变革，成为国际关系中活跃而正能量。

^① Stephany Griffith-Jones, “A BRICS Development Bank: A Dream Coming True?”
Discussion Paper for United Nations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No. 215, p14,
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osgdp20141_en.pdf

^② Joe Thomas Karackattu, “BRICS Development Bank: the Way Forward,” *Issue Brief for 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 August 30 2013, <http://icwa.in/pdfs/IBBricsdevelopment.pdf>

^③ 朱杰进：“金砖银行历史性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载《文汇报》2014年7月15日，第6版。

金砖银行的诞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地位由被动消极到主动积极的变化。在过去 20 至 30 年中，新兴市场国家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但这些资金往往被用来购买低收益的美国国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又回流到了美国。金砖银行的成立将会极大地改变不平等的资金流动，为金砖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将闲置的外汇储备转化为建设融资的平台。

人们注意到，与金砖银行同时问世的还有初始资金规模为 1000 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这是金砖国家逐步建立自主金融危机管理模式的尝试。上世纪 80 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 90 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固然各有不同的根源，却都证明新兴市场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金融风险也在不断集聚。近期在受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等经济政策的影响，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又出现大起大落，并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金砖国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了外汇储备库。此外，不能排除金砖国家还可仿照 G20 框架中的金融稳定委员会^①的模式，酝酿成立金砖国家之间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以提供有效的金融风险管理，探索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危机管理的新模式。

第二，金砖银行与 IMF、世界银行等现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现有的国际多边金融组织主要是从发展援助的角度，注重向发展中国家输血，并附带繁琐的申请程序和条件要求。世界银行的贷款主要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减贫，但贷款的申请周期、手续和其它门槛很高，并且附带受援国实行“民主自由制度”等条件。即便如此，世界银行的援助仍杯水车薪。据估计，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只满足了全球 2% – 3% 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超过 1 万亿美元。更为雪上加霜的是，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来自公共部门还是来自私人部门的资金都出现明显下降。^②成立金砖银行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便利和充足的基础建设投资，填补现有多边金融机构留下的巨大缺口。

还可预料，金砖银行与现有金融体系完全能实现相互利益增进。由于国际评级组织集中在美国，金砖银行在短期内很难获得像世界银行一样的 3A 评级。因此，金

^① 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简称 FSB），其成员包括 20 国集团成员国的央行、财政部与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各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与各专业委员会，是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组织。FSB 前身是由七国集团组成的金融稳定论坛（FSF）。在 2009 年的 20 国集团伦敦峰会上，FSF 决定接纳各 20 国集团中的新兴国家成员，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作为全球性的金融监管机构。

^② Amar Bhattacharya, Mattia Romani and Nicholas Stern, “Infrastructure for Development: Meeting the Challenge,” Policy Paper at the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Economics and Policy 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June 2012, p. 5, <http://www.cccep.ac.uk/Publications/Policy/docs/PP-infrastructure-for-development-meeting-the-challenge.pdf>

砖银行已经表示不仅欢迎其他发展中国加入进来，也欢迎发达国家通过开放股权的方式进行合作。这一方面可以拓宽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升其在国际资本市场的信用评级和竞争力。^①

第三，金砖银行有助于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谋求更大的话语权。如前所述，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根据出资额的多少来决定话语权的大小，出资多的大国的话语权大于出资少的大国，充当贷款国的大国与充当借款国的小国之间不平等就更为显著。金砖国家明确反对这种形式，在《福塔莱萨宣言》中强调，虽然各國能力和水平不同，但在全球经济、金融和贸易事务中应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参与平等。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中，处于决策地位的是发达国家。世界银行长期被诟病的一点就是只从发达国家的利益需求和发展经验出发，片面教条地推行“华盛顿共识”，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条件和需求。金砖银行的主要管理人员和职员将来自金砖五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结构的变化，将为更好解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通过优化机制设计使得金砖银行所提供的服务更“察实情”、“接地气”提供保证。

过去，无论是被经常引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报告，还是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区域性金融机构的报告，其起草和基调都由美国及其盟国主导。甚至有人刻薄地说，IMF 报告的基调实际上是美国财政部、美联储来定的。毫无疑问，金砖银行的年度报告将会更多地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和声音，成为人们判断世界经济走向的另一个权威资料。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金砖银行的筹建和运行将会极大地促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实质性进展。各方已经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方案无法落实表示失望和严重关切。这将对 IMF 合法性、可信度和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IMF 改革系各国高层承诺，只能向前，不能后退。金砖国家领导人一再呼吁，必须使 IMF 治理结构现代化，以更好地反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不断增加的权重，确保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

金砖银行的筹建和运行，将对 IMF 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在改革上的敷衍推诿形成倒逼机制。按照金砖银行的章程，金砖银行的经营对象并不仅限于金砖五国，任何国家均可申请援助或向银行融资。阿根廷、埃及、尼日利亚、哈萨

^① 叶玉：“金砖银行应保持开放性”，载《解放日报》2014年7月14日，第4版。

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国家均是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也是金砖银行的潜在成员。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金砖银行将形成巨大的非西方的金融网络，从而倒逼 IMF 等国际金融组织加速改革。

结语

综上所述，“包容性竞争”理念是金砖合作的基本准则，也是金砖银行的立行之本。在“包容性竞争”理念的指导下，金砖银行将会十分注重同美欧发达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从外部推动传统国际金融体系在理念思路、经营方式、话语建构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同时，金砖银行也将会本着“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妥善处理好金砖国家之间、以及新兴经济体之间可能发生的分歧和差异，充分考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把金砖国家之间务实合作提升至高质量的新水平。

当然，金砖国家对西方国家可能的掣肘乃至打压还要有足够的准备，在竞争中求合作，在竞争中求团结，权衡好包容与竞争之间的辩证关系。

（作者简介：樊勇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金砖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200433；贺平，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上海，200433）

收稿日期：2015 年 1 月

（责任编辑：赵裴）